

孫中山遺蹟與辛亥革命

梁炳華博士

甲. 歷史背景

香港在辛亥革命運動中所發揮的功能和作用，無論在宣傳、籌款、吸收革命分子、引入革命思想、策劃革命行動，甚至供革命分子藏匿等，都是首屈一指的。就以革命先驅者孫中山先生而言，他一生來往香港及在港求學、組織革命，約有九年的時間，當中大部分的日子就是在中西區一帶度過的。

他在自傳中提到十八歲時前往香港，「先入拔萃書室(Diocesan Home)，數月之後，轉入香港書院（當時稱為中央書院，Queen's College, Hong Kong）。又數月，因家事離院，再往夏島，……二十一歲改習西醫，先入省城美教士所設之博濟醫院(Canton Hospital)肄業，次年轉入香港新創之西醫書院(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五年滿業，試拔前矛，年二十六歲矣。……於中學獨好三代兩漢之文，於西學則雅癖達文之道(Darwinism)，而格致政事，亦常流覽。至於教則崇耶穌，於人則仰中華之湯武，暨美國之華盛頓焉。」(註：見羅香林:《國父在香港之歷史遺蹟》，64頁，1971年。)

孫中山先生可謂置身中西文化交匯的中心。

香港對中國大陸而言，是一個地理上相連，但政治上卻與外國無異的地方，是策動革命的「安全島」，在推動革命上擁有以下的優點：(1)是英國的殖民地，受到英國以至西方世界的庇護。比諸中國沿海的外國租界，更有利於革命黨的活動。(2)鄰近中國華南地區，方便革命志士及軍火的進出；(3)香港的華籍居民眾多，而且愛國心濃厚，便於招募革命志士和籌募經費；(4)香港的航運發達，與世界各地有緊密的聯繫，是無可比擬的革命聯絡中心。

香港是孫中山先生的思想發源地，他在港逗留期間，香港的進步與文明，在他的腦海裡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承認「革命思想，係從香港得來。回憶三十年前，在香港讀書，功課完後，每出外遊行，見得本港衛生與風俗，無一不好」。(註：羅香林：《國父在香港之歷史遺蹟》，41 頁，香港珠海書院，1971 年。羅據 1923 年 2 月 21 日之《華字日報》。)他在 1883 年初入拔萃書室讀書，1884 年轉往中央書院繼續學業。次年離港前往檀香山。1887 年返回香港的西醫書院就讀，迄 1992 年畢業。他曾表示選擇香港西醫書院，是「以其學課較優，而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註)他在港求學期間，感受到香港的自由風氣，及中西文化交流的盛況，孕育出他革命救國的理想。他表示：「文早歲志窺遠大，性慕新奇，故所學多博雜不純，於中學則好三代兩漢之文；於西學則雅癖達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流覽。至於教則崇耶穌中於人則仰中華之湯武暨美國華盛頓焉。」(註)

與孫中山先生關係密切的「輔仁文社」，是一班愛好新學的商人組織。他們著重購買新學書報，開啓民智，自 1892 年始開會地點定於中環百子里一號二樓。

1895 年十月孫先生在廣州起義失敗，滿清當局予香港政府很大的壓力，革命活動也沈寂起來。1899 年，陳少白奉孫先生之命，到港創辦黨報——《中國日報》，意思是「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報館設於中環士丹利街二十四號，兼作興中會之會務及軍務機關。成為革命黨人聯絡活動的根據地。

若稱香港為辛亥革命的基地並不為過，而中西區更是這個基地的核心。統計武昌起義之前，中國各地之武裝起義有三十二次，(： 蔣，頁 7) 香港籌劃者有八次；而行刺清朝官吏的事件有十一次，以香港為策劃基地者有三次。就以第一次起義的「廣州之役」為例，興中會的幹部便是在中環士丹頓街十三號「乾亨行」舉行籌備會議。其他各次起義雖不是以香港為策劃地，但也多賴香港為訊息傳遞的中心。

1895 年廣州之役起義經費需港幣三萬多元，其中二萬元便是在香港籌募得來。總計各次起義之捐款，在香港中西區一帶經商的華人捐獻了好一部分，雖然革命經費並非全部由香港募捐而來，但不少海外的捐款都以香港中國日報或金利源商店為收集之所。

當時對革命支持不遺餘力者有香港一代富商李陞之孫、殷商李玉衡之子李紀堂，他不惜毀家相助。他曾擔任日本三菱輪船公司之巡視員，偶於一艘往日本的船上認識孫中山先生，面約以後合作。後得陳少白介紹，加入興中會。其父去世後，遺下百萬家財，(註：羅香林：《國父在香港之歷史遺蹟》，34 頁，香港珠海書院，1971 年。) 李紀堂更爲革命盡力，差不多把全部家財都捐獻予革命之用。到他的錢財耗盡之後，只餘下青山的一個農場(今屯門新生農場)，所得農牧產品也用來支援革命，而香港著名的青山紅樓，是 1920 年代的建築物，據說前身便是他所經營的農場的事務所，(註：據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資料。) 經常用來接待興中會之革命志士。(註：同上)

(以上參照梁炳華：《中西區風物志》之內容。)

乙. 孫中山在港歷史遺蹟簡介:

孫中山在港留下不少足蹟，很多地方尤其港島中西區更是其中的表表者。

1. 拔萃男書院(曾就讀之中學): 是聖公會在港創辦的一所英語寄宿學校，位於現今東邊街口，創辦於 1869 年。孫中山早年在檀香山的一所聖公會主辦的中學讀書，受基督教的薰陶，受洗成爲基督徒，惟該校校長表示須得父兄同意，但其父兄聽後大怒，更召他回國，孫中山只得輟學回鄉，受到老父痛斥和家法對待，(註：同上。) 他積憤難平，便到北帝廟把神像的手折斷，惹起村民反感，其父乃令之避居香港。他於 1883 年抵港後，11 月入讀該校。該校於 1926 年遷往九龍，原址 1941 年改建爲羅富國師範學院。1962 年至 1971 年間，作爲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的校舍。
2. 美國公理會佈道所: 位於必列啫士街 2 號，孫中山與陸皓東於 1883 年底在這裡接受美國公理會喜嘉里牧師洗禮，註冊姓名爲孫日新，其後，區鳳墀據此爲他改號爲「逸仙」。(註：陳勝旻、郭景榮:〈孫中山在港活動史跡調查追記〉，載《亞洲研究》，雙月刊，第十三期，1995 年 4 月 10 日，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出版。) 但他之信奉基督教，使其父兄甚爲不悅。(註：羅香林：《國父在香港之歷史遺蹟》，6 頁，香港珠海書院，1971 年。) 1884 年他在中央書院讀書時，也在這佈道所的二樓居住。及後其兄孫眉不欲他在港信奉基督教，所以藉口要他幫手管理業務，召

他再度前往檀香山。(註：劉粵聲：《香港基督教會史》，296 頁，1941 年 8 月初版，1996 年 11 月二版【重排增訂版】，香港浸信信教會出版。) 該會由於會眾日多，故於 1898 年在樓梯街購下 2294 地段，建造新堂，1901 年由必列啫士街 2 號遷往新堂。必列啫士街 2 號輾轉數變，戰後，由政府建為樓高兩層的必列者士街市場，售賣肉類和雞鴨。(註：羅香林：《國父在香港之歷史遺蹟》，10 頁。)

3. 中央書院 (曾就讀的第二所中學，即後來的皇仁書院)：位於歌賦街 44 號，與荷里活道及城隍街交界。是香港第一所官立中學，孫中山於 1884 年 4 月 15 日開始在此讀書，當年他 18 歲。(註：羅香林：《國父在香港之歷史遺蹟》，8 頁。) 至 1886 年為止。據 1937 年皇仁書院黃龍報記載孫中山入學紀錄，他入學時的姓名為孫帝象 (Sun Tai Tseung)。他在中央書院讀書時間雖然很短，但對其革命事業也有影響，因中央書院之舊生不少受孫中山的感召，喜與他相往還，並樂意協助其革命工作，如胡禮垣及何東等。(註：羅香林，12 頁。) 原址在 1893 年改建為庇利羅士女書校。1957 年改建為荷里活道官立小學。1978 年作為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
4. 中央書院的第二個校址：該校於 1889 年遷往鴨巴甸街及荷里活道交界，並易名為維多利亞書院。孫中山未有在此讀書，但曾出席由港督主持的奠基禮。1894 年改名為皇仁書院，當時的規模為全港之冠。該校於 1941 年日軍軍侵港時遭炸毀。1950 年該校遷往銅鑼灣。現今該地為荷里活道警察家屬宿舍 (Police Family Quarters)，惟昔年皇仁書院的台基仍隱約可見。
5. 雅麗氏醫院及附設之香港西醫書院：原名為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位於荷里活道 75-81 號，與鴨巴甸街交界處。雅麗氏醫院由何啓與倫敦傳道會於 1887 年創辦，院內附設香港西醫書院。同年孫中山從廣州博濟醫院轉來就讀，是該校最早註冊的第三人。1892 年他以十科考卷均獲榮譽成績畢業。這是他完成大學教育的學府。比起檀香山的埃奧蘭尼學校、香港的拔萃男書室、中央書院關係更為密切。1913 年，香港西醫書院合併於香港大學，至 1915 年結束，成為港大醫科的前身。孫中山在倫敦蒙難脫險後，曾著有《倫敦蒙難記》一書，曾載他在香港西醫書院讀書的經過：「……當一千八百八十六時，予

學醫於廣州之英美傳教會，主政者為醫學博士戈爾(Dr John Kerr)。次年，聞香港創立醫科大學，遂決計赴香港肄業，閱五年而畢業，得醫學文憑。」(註：原著為英文本，此文據 1927 年上海新文化書社初印本《中山全書》之譯本)。

他在 1918 年所著之《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的內容中提到：「予在廣州學醫甫一年，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予以其學科較優，而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學校肄業。」

當孫中山在 1925 年於北平(今北京)病故時，港大註冊部即致電治喪委員會：「……蓋此校(按指港大)可認為先生之母校，蓋先生於 1892 年得醫學士之阿麗斯紀念醫院(即雅麗氏醫院)，頃已合併於斯校……」港大並以全校學生名義致電，謂：「孫公逝世，喪我元勳，噩耗傳來，舉校悲愴，謹此電唁，以表哀忱。」(註：見羅香林：《國父在香港之歷史遺蹟》，18-19 頁。)

原有的雅麗氏醫院為擴充需要，於 1893 年遷往般咸道二號。後更與相連而同屬倫道會管理的那打素醫院、何妙齡醫院合併。荷里活道原址已出售，改成其他用途。

6. 舊香港大會堂：位於舊中國銀行大廈及匯豐銀行大廈之間。孫中山於 1892 年 7 月 23 日在此大會堂參加香港西醫書院的第一屆畢業禮。他以「特殊優等」的成績畢業，被選為畢業生在典禮中致辭。
7. 道濟會堂：位於荷里活道與卑利街交界處，坐北向南，今荷里活道 73 號至 57 號一帶，即舊雅麗氏醫院旁邊，由倫敦傳道會為華人基督徒所舉辦，自 1888 年孫中山就讀於香港西醫書院時開始，便常到此聚會，與該堂堂長區鳳墀及王煜初牧師稔熟，他們後來都很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如 1895 年廣州之役失敗後，在廣州掩護孫中山脫險的，多是與王牧師和區鳳墀等有關的人物；他在倫敦蒙難，脫險後也曾致函區鳳墀，見證他以七日不絕祈禱而獲救，感謝基督的大愛。(註：〈孫總理致區鳳墀書〉，載《香港基督教會史》，303-304 頁。)

此堂以教友日增，地方不敷應用，於 1926 年遷往般含道，並易名為中華基督教合一堂。舊址於 1925 年出售，並改為商業樓宇，惟幸昔年道濟會堂的石額，經該堂的牧師張祝齡移嵌於合一堂正門右邊的牆壁上。

8. 杏讌樓：是一間西餐廳，位於威靈頓街，孫中山經常和朋友在這裏會面。
9. 楊耀記：位於歌賦街 8 號 (今歌賦街 24 號)，與舊中央書院相鄰，並與原香港西醫書院相近，是孫中山好友楊鶴齡的祖店，楊鶴齡在店內樓上闢一談話之所，與孫中山、陳少白、尤烈經常在此聚會，暢談反清的革命理想，被朋友戲稱之為「四大寇」。孫中山經過香港時，很多時都會到該處小住。

民國初年，楊家家道中落，楊耀記轉售予人，六十年代原址改為「永德生記印務店」，樓高三層。

10. 輔仁文社：位於百子里 1 號二樓，地方較隱蔽，便於躲避警方耳目，是革命分子楊衢雲和謝纘泰於 1892 年所創立，輔仁文社的社員時常討論國家大事及政治改革問題，亦有志於革命運動，孫中山與部分社員來往甚密，並邀請其社員加入，一起成立興中會，部分文社社員如楊、謝與周昭岳等人後來都成了興中會的創會會員。原址已經拆卸，而該處的入口處和小巷梯級，昔日為社員出入所經之路，現在仍然維持原狀。
11. 香港興中會總部舊址：位於士丹頓街 13 號，屬當時立法局非官守議員黃勝之子黃詠商所有，黃詠商是興中會的創會會員之一。興中會創立於 1895 年，是孫中山創立的第一個革命團體。當時以乾亨行的店號為掩飾，作興中會總部，取名乾亨，是參考《易經》經文：「乾元、奉行天命，其道乃亨。」這是黃詠商的意思。據《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記載：「……至甲午中東戰起，以為時機可乘，乃赴檀島、美洲，創立興中會，……欲襲取廣州，以為根據，遂開乾亨行於香港，為幹部。」興中會總部成立時，入會者須高舉右手宣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鑒察。」（註：羅香林：《國父在香港之歷史遺蹟》，27 頁。）並選任楊衢雲為第一任會長，至 1899 年始選任孫中山為第二任會長。1900 年 11 月 20 日，清朝官吏買兇在中環結志街五十二號二樓將楊衢雲殺死，興中會人將楊葬於香港跑馬地公共墳場第 6348 號墓地。乾亨行舊址後來成為「永善菴」的所在，附近一帶現時仍是一個佛教徒尤其是尼姑聚集之所。

12. 中國日報報館：位於士丹頓街 24 號（現時為著名的陸羽茶室），中國日報於 1900 年 1 月創刊，所有機器及鉛字皆是孫中山在日本橫濱所購。該報是陳少白奉孫中山之命所出版的一份興中會（及後來的同盟會）的機關報，據《孫文學說》第八章所載：「由乙未（1895 年）以至庚子，此五年之間，實為革命進行最艱難困苦之時代也。……當此之時，革命前途，黑暗無似，希望幾絕。而同志尚不盡灰心者，蓋正朝氣初發時代也。隨予乃命陳少白回香港，創辦中國日報，以鼓吹革命。」中國日報維持了十一年，一直宣揚反清思想，號召國人革命，並成了革命分子經港時下榻和聚會的地方。陳少白口述興中會革命史要載：「中國日報者，唯一創始之公言革命報，亦革命過程中繼往開來之總樞紐也。……不數年國內商埠，海外華僑，聞風興起，同主義之報林立。而惠州之役，固亦以中國日報為總機關之地也。」當時報館的經費主要由香港富商李煜堂、李紀堂等大力資助。1901 年，中國日報館址遷至中環永樂街，同年 12 月，孫中山曾攜眷在報館三樓小住數天，1905 年，館址再遷往中環德輔道中 301 號。至今這三個中國日報的舊址都已拆卸重建。（註：羅香林：《國父在香港之歷史遺蹟》。）
13. 和記棧：是革命機關，位於德己笠街，是革命分子策劃革命活動的秘密會址。當時以鮮果店作為掩飾。1903 年的廣州之役也曾在這裡商議的。
14. 同盟會招待所：孫中山於 1905 年將興中會與華興會、光復會等合組成同盟會，1907-1908 年間，同盟會香港分會為配合在潮州黃岡和惠州七女湖起義，在堅道、普慶坊、摩利臣山道、灣仔進教園、皇后大道東等一些住宅樓宇設立招待所，（註：見吳倫霓霞等編：《孫中山在港澳與海外活動史蹟》，59-60 頁，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出版，1986 年。）供往來香港的革命分子容身。如胡漢民夫婦、汪精衛、黃克強、譚人鳳、朱執信、孫眉、楊德初及不少革命分子在起義失敗逃港時，都會到這些招待所或中國日報報館暫時棲身。

革命黨人在擺花街設立行動部，作為製造炸彈和轉移革命志士的地方。另外，為配合 1911 年 3 月 29 日的黃花崗起義，黃興在跑馬地 35 號（有可能是黃泥涌道 35 號，因那裡曾是同盟會南方支部。）建立統籌部。他在起義失敗及受傷後，退至香港及匿居在擺花街的行動部。至八十年代該處已成為民居樓房。

(註：陳勝焜、郭景榮：〈孫中山在香港活動史跡調查追記〉，載《亞洲研究》，129-130 頁，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第十三期，1995 年 4 月 10 日出版。)

15. 紅樓：位於屯門龍門路近蝴蝶邨旁之中山公園，即往昔之青山農場內，而青山農場是革命志士李紀堂於 1900 年所闢建，位於青山東南之山坡，由散石灣以東至青山白角，面積二百五十多畝。用作革命策劃場所，並供革命黨人藏匿。其辦事處以紅磚建成，高兩層，人以其為紅磚所建，又接近白角，故稱之為白角紅樓。農場設有儲藏軍械及炸藥之倉庫，紅樓左邊的山坡曾用作練習射擊的靶場。(註：羅香林：《國父在香港之歷史遺蹟》，34-35 頁。)

著名的革命家黃興、朱執信等也曾在紅樓居留，據說紅樓右側山坡上的三株棕櫚樹，是黃興所親手種植的。(註：莫世祥：〈中山革命與李紀堂毀家紓難〉，載《亞洲研究》，134 頁，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第十三期，1995 年 4 月 10 日出版。)

志士李紀堂、鄧蔭南、孫德彰都曾在青山農場經營過，一方面從事農牧生產，一方面接待黨人及籌劃革命活動，最多是有二、三百人，大多是革命黨人，他們從事農植、養殖、製造炸彈，練習射擊，辦理儲運，在革命行動前掩護黨人，縫製旗幟，如 1910 年廣州新軍之役，所用的青天白日旗便是在這裡製造的。(註：李雲漢：〈孫中山的革命始於香港〉，載《亞洲研究》，152-153 頁，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第十三期，1995 年 4 月 10 日出版。)

1910 年，青山農場經理鄧蔭南在紅樓西面瀕海的稔灣浪濯村建一所經營糖和椿米的大廠，安頓逃港的革命志士。並以鐵枝和紅磚建成一座碉堡，作為防守瞭望之用。並自紅樓築一石路，與大廠相連，以作危險時的通道。現時大廠已經改建，而碉堡尚存，編為該村的 39 號。(註：羅香林：《國父在香港之歷史遺蹟》，37-39 頁。)

辛亥革命之後，李紀堂於去世前將農場出售。農場改稱為新生農場。近年場主將之闢為中山紀念公園，並設置孫中山的銅像，又豎立了「孫逸仙博士紀念碑」，刻了一些他的墨蹟如「天下為公」、「博愛」等。

至今為止，有關孫中山在港的革命遺蹟絕大多數已經湮沒，碩果僅存的只剩下道濟會堂石匾、百子里 1 號的入口和青山農場而已。其餘的都只留下遺址了。